

澳洲缘

苏州大学 王国富
1998年

过去的二十年间，我有幸三次去澳洲学习。这是二十年前万万想不到的事。去年十月，我第三次赴澳洲。晚饭后，家人送我到上海虹桥机场。小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平坦舒适，秋天的田野一片金黄，宽阔的公路两旁，新建的漂亮雅致的农舍，不时地映入眼帘，仿佛已经到了澳洲。

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祖国正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记得二十年前我们离开广州来到香港时，顿觉到了另一个世界。广州那么静悄悄而香港则人们熙来攘往，狭窄的街道被霓虹灯照得通明，商店里东西琳琅满目，应有尽有，一派繁荣的景象。铺子都收拾得窗明几净，舒适宜人。但从香港到悉尼又觉步入了另一个天地，街道宽敞，英国式的小洋楼鳞次栉比，绿茵遍地，干净清静，仿佛是个世外桃源。在去机场的路上我突然发现中国正在悄然地向其靠拢。

一个普通的中国知识分子二十年中三下澳洲，确算幸运。要不是邓小平领导中国走改革开放之路，不要说三下澳洲，恐怕在大学里安顿地教书还得不到保证，说不定仍在乡下务农。但是对于我个人来说，能去澳洲与我选择英语作为我的外语不无关系。

那是四十年前的抉择。1957年我初中毕业，考上了苏州市第一中学。暑假的一个傍晚，我正在树荫下纳凉，邮递员送来了录取通知书。拆开后发现还有一张附表，要求选择俄语或英语作为外语。当时我还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孩，对俄语和英语都一无所知。英语只认识 a b c, x y z 几个字母，还是数学课上学到的。俄语则连字母都不认识，虽然它是当时唯一流行的外语语种。由于中国当时实行全盘苏化的一边倒的政策，五十年代初期，英语被作为帝国主义的语言而禁止。大学、中学只开俄语，而且中学生俄语学得好的，毕业后就直接被送到苏联去上大学。其吸引力可谓大矣。然而，五十年代中期，由于国际局势的微妙变化，英语又悄然回到了学校。1957年市一中要求一半的学生选学英语。我正在踌躇之际，坐在我身旁的一位邻里大爷喃喃地说，“英语是万国通用语。”由于他本人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他的一句话便使我下了决心，选择英语作为我的外语。当时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一选择三十年后竟会对我产生如此大的影响。

行李托运好后，我挥手向家人告别，然后独自步向19号候机室。一进门，我便看到人头济济，可一眼望去却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中国人。我突然怀疑我是不是跑错了地方，因为在我的想象中绝大多数人应是老外才是，不禁有些纳闷。但再仔细一想就茅塞顿开。二十年前，中澳之间没有直达的航线，必须绕道香港，而今多家航空公司开辟了直航业务。道理很简单，中澳之间的往来成十倍地增长。在澳的华人新移民已达十万之众。他们定居后还怀着特有的“中国情结”，奔波于南北两半球之间，或做生意，或还乡探视；稍待站稳脚跟，便邀请父母前往探亲，以尽孝道。再加上我们这些学子出出进进，难怪人来人往，候机室里满目华人了。

第一次从上海直飞悉尼，仅十个小时，第二天凌晨便在悉尼机场降落。一出机场便有本系的年轻老师接候，觉得分外亲切。二十年前悉尼只有9个中国留学生，现在苏州大学英语系在悉尼留学的就不下9人，在艾希费尔德形成了一个小小的苏大社区，可见变化之大。

悉尼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步出机场，觉得旧时的景象依稀可见，一切都那么熟悉。我出生在苏州附近的一个乡村小镇，在那里度过童年之后便来到苏州。没想到在苏州一呆就是四十个寒暑。苏州可谓我真正的故乡。但是出人意料的是，除这两地外，我呆得最长的地方却不在中国，而在澳洲。在悉尼我累计住了三个年头，难怪对悉尼的大街小巷比上海的或北京的更为熟悉。这也许也是一种缘份。

我之所以会三次到澳洲求学，看来也是“千里有缘来相会”之故。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便决定向国外派遣留学生，我幸运地受学校推荐并为教育部所录取，成为首批出国留学的学子。十月间接到通知，我们十人将去澳洲学习。当时，澳大利亚对我来说还是一个较为陌生的名字。除了它位于南半球，盛产羊毛，以澳毛著称于世外，我对它所知寥寥。获悉后，我就冲到学校图书馆和系资料室，希望能找到一些有关材料读一读，以免到澳洲后，因对它一无所知而显得狼狈。可是使人少兴的是，我一无所获。中文的资料没有，英文的资料也没有。我就这样头脑空空地踏上了澳洲的国土。此外，我们厦门的一位同学，因未能过体检关而最终被淘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澳洲被称之为九人帮。

我们到澳洲时已经步入中年，从1957年开始学习英语算起，已有20多年了，出国时又通过全国性的选拔考试，自以为英语已经过关。可是一踏上澳大利亚国土，发现情况并不尽然。澳洲人讲的英语，有时我们根本听不懂。看电影或看电视时，澳洲人哈哈大笑，我们却不知道他们在笑什么，因而十分尴尬。

第一次到澳洲时，我们被安置在悉尼大学附近的国际留学生宿舍。宿舍主任对第一批来到澳洲的中国留学生特便热情。第一个周末便组织了欢迎我们的 Barbeque。闲聊时，他对我们半开玩笑地说，“I'm a fair dinkum aussie. I'm not kidding*.”一时间，我怎么也跟不上。这些词以前从来也没有听说过，顿时觉得云里雾里。倒不是他的讲话有多么深奥，而是这些澳大利亚词语以前闻所未闻，当然就不知所云了。后来发现 dinkum 这个词还是来自汉语的借词，是广东话里的“真金”。淘金时期，广东去的侨民在金矿里发现金子的时候便大声高叫“dinkum (真金)”。由此澳洲人便创造出了“fair dinkum”这个词语。

有一次我到中央车站去搭乘火车，一上站台我便问车站服务员火车到了没有。他答曰：“You're lite, mite.”我愣了几秒钟才悟出这是澳洲版的“You're late, mate.”澳大利亚的方言土语、澳大利亚英语中特有的澳洲词语和澳大利亚人的发音一时困扰了我们，觉得学了二十几年的英语怎么根本就没有学好，自信心几乎丧失了一半。我想如果国内有一部《英汉澳大利亚语词典》该多好。出国前学一学，出来就没有这么多麻烦了。

从那时起我就有意地收集有关澳大利亚英语的词书，打算回国后编写一部这样的词典，为以后来澳洲的人提供一点方便。然而，这一夙愿直到1992年才得以实现。1991年莫纳希大学的尼尔·科特尼先生来苏州大学任教，我们策划了这一项目。澳大利亚前总理惠特拉姆先生亲自为这部词典撰写了前言。词典在1992年的第三届中国澳大利亚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举行首发式的时候，受到了中澳与会者的一致好评。这是国内目前最完备的一部《英汉澳大利亚语词典》。1997年在澳大利亚由“中国书店”重印发行。

七十年代末，在悉尼就我们9位中国留学生，分别在英文系和语言学系学习。两位系主任克拉玛教说和韩礼德教授任我们的导师。他们对我们的特别的关心，我们至今铭记在心。据说当时墨尔本大学和悉尼大学都希望这批学生去他们学校学习。后来悉尼大学获胜了，我们便来到了悉尼。

中国由于闭关三十年，教育上与西方国家脱了勾了。我们到了悉尼大学，起初在学习上感到诸多的不适应。当时教育部在学习上对我们倒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只要我们根据各自的情况，能学到东西就行。但当时我们年轻气盛，觉得能拿个硕士学位没有什么不好，便向学校提出申请，但答复是，第一年要读预科，当时我们不甚理解而有些想法。去年年底，克拉玛教授在悉尼大学举行的庆祝中澳建交25周年纪念宴会上的讲话中透露，当时校方坚持说这批中国学生没有“学士学位”不能攻读硕士。但她告诉校方这批学生十分优秀，在她的再三推荐下，第二年方予准入，而且第一年读的学分全部予以追认。我们就这样在两年中顺利地完成了硕士学位的学习任务。现在好了，中国已经恢复了学位制度，学生出国深造就不会再有我们当年的苦衷。

1981年初，我们离澳回国前夕，悉尼大学特地为我们9位中国留学生举行了毕业典礼，授予我们硕士学位。我们在澳洲的亲朋好友都高兴地赶到学校参加我们的毕业典礼。澳洲的几家报纸、电台和电视台都作了报道，因为这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中国学生在澳大利亚取得硕士学位。

我们在澳大利亚留学的两年中间，在学业上有了很大长进。这对我们日后的教育和科研有很大帮助。当然，我们也没有辜负我们母校悉尼大学对我们的栽培。回国后大家在学术上都作出了成绩。有的当了学校的副校长，有的当了系主任，好几位是国家教委教材编审委员会的成员。因此，这批学生在80年代中国的英语教学界颇有影响，被戏称为“澳帮”。

回国后，我们不少人将“澳大利亚研究”引入了我们的教育和研究，并先后在各自的学校里建立了澳大利亚研究中心。1988年举行了第一届中国澳大利亚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并成立了“中国澳大利亚研究学会”，以促进中澳两国的学术文化交流。不少澳大利亚文学名著被译成中文，介绍给广大的中国读者；有关澳大利亚作品的文学论文时见报端，专著亦有问世；澳大利亚英语词典也已编辑出版。甚至还招收了澳大利亚文学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今天“澳大利亚”对于寻常的中国老百姓来说，已不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也不再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了。可以说，它已广为人知。

苏州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成立於1991年1月，是苏州大学从事澳大利亚研究学人的学术团体，其成员主要是曾经在澳大利亚学习和工作过的归国人员，从事过或正在从事澳大利亚研究的人员，或对澳大利亚研究感兴趣的人们。它的宗旨是组织和推动苏州大学的澳大利亚研究，促进中澳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两国之间的学术文化交流，增进和发展苏州大学与澳大利亚各大学之间的友好关系。中心虽然成立较迟，但至今已初具规模，不断地有澳大利亚研究方面的科研项目，招收了澳大利亚文学的硕士研究生，拥有自己的办公-阅览室和相当数量的藏书。1992年与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一起操办了第三届中国澳大利亚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

中心的成立从无到有，也经历了艰苦的历程。“澳大利亚研究”不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能理解的课题。不少人则提出“干吗进行澳大利亚研究？有什么好处？”，并投以怀疑的目光。如同其他中心在澳大利亚前总理惠特拉姆来访前夕才挂牌一样，苏州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直到第三届学术讨论会要到苏州大学来举行才予成立，而且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是一个“三无”中心：无编制，无票子，无房子，有着一部难诉的白手起家、艰苦创业的历史。后来，多亏澳中理事会、澳中友协、澳大利亚驻华使领馆、中国驻澳使领馆、苏州大学及其外国语学院的支持和帮助，才有今日的模样。

我第一次回国到第二次赴澳学习，前后相隔十二个年头。由于我和莫纳希大学的尼尔·科特尼先生一起编写和出版了《英汉澳大利亚语词典》，我很快被麦夸里大学词典研究中心所接受，在那里学习了六个月。回国前夕，我受麦夸里出版社的委托，将该社出版的《简明麦夸里词典》带回中国译成中文出版。

1995年9月，当我完成400多万字的《简明麦夸里词典》最后一批译稿的定稿工作的时候，顿觉如释重负，心潮起伏，有一种难以名状的喜悦。1993年5月，我揣着澳大利亚麦夸里出版社要我将该词典译成汉语出版的委托书回国，其情其景仍历历在目，仿佛是昨天发生的事情。然而，回顾这二年多的不平凡的岁月和多少个伏案工作的日日夜夜，今天想来不免有一种后怕，不知当时怎么会有如此的勇气和毅力。译事的顺利完成，主要得归功于所有的译者、副主编、总审校和一切参与此事的人士。没有他们锲而不舍的工作、一丝不苟的精神和团结共事的胸怀，要在短短两年中完成这样一部巨著的翻译是不可想象的。

令人兴奋的是，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亚历山大·唐纳先生为中译本撰写了前言。他写道：“这部词典本身就是通过合作能够有所成就的一个极好的例证。它是麦夸里出版社、苏州大学出版社、以王国富教授为首的一批具有献身精神的中国译者以及澳大利亚的语言学家和词

典编纂家之间多年合作的成果。”词典可望在1998年年底出版。

有机会第三次赴澳学习始出所料，有其极大的偶然性。照理象我这样公派出国两次的人，一般很难再获公派出国的机会。但1996年国家出台了公派出国留学的改革方案，把原来给各学校下达指标，由学校选送的办法，改为向全社会开放，由个人申请、学校推荐、专家评审、择优录取、签约派出、违约赔偿的办法。一次偶然的机，我看到了申请的章程，发现我还在合格者的临界年龄之内。五月申请，十月见报，我就这样第三次来到了澳洲。

我这次回到母校悉尼大学，是与教育学院副院长、诗人Roslyn Arnold博士合作编写一部《澳大利亚诗歌选》，作为中国大学生的一部教材。从商定编写原则，到收集材料、确定篇目、讨论各诗所表现的主题，最后写出样稿，前后共六个月，项目初具雏形。

在此期间，我还获得了一次在澳洲东南沿海游学的机会，出访了黄金海岸的邦德大学、布里斯班的格利菲斯大学、阿默岱尔的新英格兰大学、塔斯马尼亚岛的塔斯马尼亚大学、墨尔本的莫纳希大学和基隆的迪金大学。访问了他们的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会见了同行，并进行了学术交流。

值得一提的是，各地澳洲朋友的热情好客和殷勤接待，我将永远铭记心头，带回中国。每到一地，我的朋友不是开车到机场就是到车站迎送，哪怕等到午夜。这真使我感动不已。

2月12日，我到黄金海岸已过午夜12点。车站虽灯火通明，但几乎空无一人，而吕先生和他的弟弟还在那里耐心地等候着。那几天我下榻他家。那是一幢建造在山头顶上的房子，两厢是平房，中间是两层楼，红瓦白墙，背后映着青山蓝天，十分显眼，也格外漂亮。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那二楼上的书房，宽敞明亮，中间的几张桌子上坐落着两台电脑，借此他坐在这里就可以迅速地与世界各地的朋友联系。四周沿墙是书架，架上有古今中外的各色书籍。房间一隅放有沙发和茶几，读书累了，可在此小憩。这是国内教授们梦寐以求的工作环境，但是不知道有多少人能拥有。

说到他家的宽敞，也是我们所无法想象的。第三天，布里斯班的华人教授会和作家协会相约在他家聚会，听我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的变化”的演讲。到会人数不下四十，可大家一起吃饭、聊天和开会，根本没有拥挤的感觉。参加他们的活动，很有感触。我觉得华人在外很有凝聚力。这是一个民间的活动，不少人得驱车几十公里，乃至上百公里才能到此，但那天还是济济一堂。当然，这与主人的号召力和女主人的热情好客分不开。这是我亲身领略到的。

吕先生听说我十七、八年以前到过黄金海岸，特地安排了半天去海滨游泳。一到那里就发现黄金海岸已今非昔比。我印象中黄金海岸是一望无际的沙滩，岸上一片荒地，很少看到房子，根本没有高楼大厦，可今天黄金海岸已是一座拔地而起的新兴城市，大楼林立，游人熙熙攘攘，已看不出当年的一点儿影子。一天，朋友带我们坐游艇出海，夕阳下黄金海岸远远就隐约可见。

阿默岱尔则又是一番景象。这是一个内陆城市，坐落在高原之上，一眼望去不见一座高楼大厦。它与黄金海岸相差一个季节，已是秋令时节，略有寒意。朋友的家是一个牧场，足有苏州大学本部的校园那么大。房舍建在牧场中央，一家三口生活在此，可谓身居世外桃源。新英格兰大学也是藏身树林之中，远离尘嚣，真是个好读书的好地方。难怪澳洲人很早就在这里建校。

塔斯马尼亚岛好比中国的海南岛，处在最南端。我虽无缘涉足海南，却有幸地来到了塔岛。从悉尼到其首府霍巴特坐飞机仅二小时的行程。霍巴特位于德文河的两岸，由大桥相连，景色与闽江上的福州相仿。塔斯马尼亚大学是岛上唯一的一所高等学府，颇为壮观。即便在这样偏僻的地方，也不乏华人的足迹。在此，我见到了在校任教的多位同胞，当然

倍觉亲切。第三天，朋友带我去霍市的郊外观光，驱车直抵“休翁谷”。澳洲诗人詹姆士麦考利曾以“在休翁谷”为题写了一首优美的哲理诗。十多年前我将其译成中文，发表在一家杂志上。但当时对诗中的描述，毫无直接的感受，似解未解，今天亲眼见到这山明水秀的谷地，绿树成荫，果树成行，苹果树的方阵整整齐齐地排列着，据说这样栽种的苹果可以用机器来采摘。“休翁谷”不愧为塔岛丰硕的苹果园，所以才能给诗人这样的灵感和启示。

离开塔岛便来到墨尔本，可在机场接候我的却有两家澳洲友人。他们都驱车前来相候，我真不知道怎样来表达我内心的感激之情。他们原来不怎么相识，可现在也成了朋友。记得曾在报端读到，墨尔本是世界上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今天再此造访，更觉话不虚传。墨市环绕菲利浦湾，视野开宽，风景秀丽，气候宜人。这是我第二次投宿在这位朋友家，他们待我象家人，又如远方来访的亲戚。他们开车送我去莫纳希大学和迪金大学盘伍德分校参观访问，又陪我游览市容和风景区。如果去广州，我想我肯定找不到这样好的朋友。这不能不说是多年来与澳洲人民结下的“缘份”。

最后一站是基隆的迪金大学。这是我第一次访问基隆。它位于飞利浦湾东侧的平原地区。基隆港历来是澳洲羊毛的一个集散港。迪金大学的“羊毛仓分校”确是别具一格的。昔日的羊毛仓库，今日成了的大学校院。仓库格局依旧，却被改造成十分适合上课的全封闭式的校舍，真是建筑学上的一个奇迹。在迪金我们也探讨了今后进一步合作的前景。

我游学后回到悉尼，发觉离澳回国的日子渐近。老师和朋友的深情的告别活动一个接着一个，有时觉得无法应接，依依惜别的深情愈盛。诗人马乔利皮泽以前未曾相识，她竟然也慕名前来我的寓所与我话别。我真受宠若惊。可以说，我第三次访澳最强烈的感受，是澳洲朋友和澳洲人民的深厚情谊。与其说我这次带回了知识，还不如说我带回了澳大利亚人民的深情厚谊。

如果说二十年前我去澳大利亚求学是“前世的缘份”，那么后两次的访问使我相信，我已与澳洲和澳洲人民结下了“不解之缘”。